

于朝贵 著

三国演义

探论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于朝贵 著



三国演义

卷一百一十五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国演义探论/于朝贵著. —重庆:西南
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0. 12

ISBN 978-7-5621-5107-4

I. ①三… II. ①于… III. 《三国演义》研究
IV. ①I207.4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35639 号

三国演义探论

于朝贵 著

责任编辑:张渝佳

封面设计:王 煤

出版发行: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(重庆·北碚 邮编:400715)

网址:www.xscbs.com)

印 刷: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

开 本:850 mm×1168 mm 1/32

印 张:9

字 数:210 千字

版 次: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1 年 1 月第 1 次

书 号:ISBN 978-7-5621-5107-4

定 价:38.00 元

序

沈伯俊

老友于朝贵先生的《三国演义探论》一书即将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，我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！

朝贵兄毕业于人民大学中文系，数十年来涉猎广泛，对文艺理论、现代文学（特别是田汉研究）、古典诗词、古代小说都颇有研究；而对位居“四大奇书”之首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兴趣尤其浓厚而绵长，退休多年后，又推出这部《三国演义探论》。这不仅表现了一位学者与生命俱在的学术追求，而且印证了《三国演义》持久不衰的艺术魅力。

本书篇幅不算大，但具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：

第一，有感而发，针对性强。朝贵兄先后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，本职工作之余从事《三国演义》研究，这固然常常使他慨叹“时间太少”，却也使他避免了“为完成任务而硬写”、“为应付考核而拼凑”的盲目性和非科学性。书中多数文章，或成于长期积累，或源自对某些学术问题、学术观点的思考，均有感而发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。

例如，在《三国演义》研究由沉寂走向兴旺的 20 世纪 80 年代，主题问题一度成为争论最为热烈的问题，出现了多种新观点。朝贵兄经过深思熟虑，在《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——〈三国演义〉主题新议》一文中提出：《三国演义》“是一部描写人才的书。‘才与才敌’是它的基本内容和故事情节发展的基本线索，描

写不同人才的命运和他们的奇智奇谋，歌颂作者认为最理想的人才，则是小说所表现出的基本倾向，也是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”，“它是我国古代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”。我将这一观点概括为“人才学教科书”说，多次予以评介。在拙著《三国演义辞典》^①和《三国演义大辞典》^②的“研究情况”部分，不仅在“关于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”这一综合条目中将其列为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，而且作为专条予以介绍。

又如，作为出版社的专职编辑，朝贵兄十分关心《三国演义》的出版情况，在岗时如此，退休后仍如此。经过几次调查，终于写成《〈三国演义〉出版刍议》一文，对明代至当代的《三国演义》出版情况作了简明扼要的梳理和高屋建瓴的评析，指出当今众多排印本基本上照搬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，沿袭了其中若干疏漏和错误，并未实现为读者提供一个“错误较少，更利于阅读的通行本”的承诺。在此基础上，对今后的《三国演义》出版工作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建议。

第二，旧题新作，自有真知。在《三国演义》研究逐步深入的情况下，每每有人叹息：“好题目已经做完”，“找不到合适的题目”。可以说，这是几乎所有比较成熟的学科或研究专题都经常遇到的问题。其实，学术研究，既需要不断开辟新的领域，寻找新的话题，也需要对已有的领域和话题反复思考，不断发掘新意。旧题新作，乃是一种普遍现象。要解决好这一问题，必须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，精读细读作品，培养善于发现的眼光^③。朝

① 巴蜀书社 1989 年 6 月第 1 版。

② 中华书局 2007 年 7 月第 1 版。

③ 参见拙文《面向新世纪的〈三国演义〉研究》，原载《社会科学研究》1998 年第 4 期，修订稿收入拙著《三国演义新探》（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第 1 版）。

贵兄正是这样努力的，因而有时看似写的“旧题”，却自有真知。

例如，论诸葛亮形象的文章可谓多矣，朝贵兄的《名士、贤相——道士、神仙——忠臣、贤相：论诸葛亮人格的演变和诸葛亮形象的塑造》一文，则对诸葛亮形象的演变过程作了深具历史眼光的概括，指出：“诸葛亮形象及其人格在长期流传和演变过程中，经历了由贤相、名士到道士、神仙再回到忠臣、贤相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和艺术创造过程。罗贯中很好地把握了诸葛亮的人格和精神实质，将其一度被扭曲的人格和精神重新纠正过来，最后完成了诸葛亮形象的塑造。”本文发表于陈翔华先生的《诸葛亮形象史研究》^①出版之前一年多，堪称一篇有代表性的佳作。

又如，对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女性形象，人们往往不予重视，有人则认为可有可无。《〈三国演义〉女性形象的阳刚美》一文却指出：“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女性形象和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故事，是《三国演义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”“她们在小说中并不像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，是‘可有可无’、‘可以删去’的人物。”这对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是有启示意义的。

第三，随情适性，乐在其中。书中一些文章，是在朝贵兄退休以后才写的。此时的他，早已无需“挣工分”、为“评职称”而写作，为的是享受阅读之趣，思考之乐，是一种摒弃功利目的的精神愉悦。因此，他写得从容而舒缓，《〈三国演义〉战争描写艺术》一文，耗时将近两年，篇幅约8万字。如此阅读和写作，真是随情适性，乐在其中。在“浮躁”已成学术公害的今天，这份淡定，很值得称道。

我与朝贵兄相交将近三十年，深知其性格开朗随和，与人为善。本书之外，他还有若干写作计划。衷心希望他继续保持良好

^①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。

的心态,为学界同行奉献更多有价值的篇章。

八年前,我在拙著《三国演义新探》前言末尾附小诗一首,后四句是:

寒宵独坐月陪我,翠岭漫行霞满肩。

公理永存知己在,得失不计且加鞭。

兹将此四句附于此,愿与朝贵兄共勉。

2010年6月25日

于锦里诚恒斋

目 录

序	(1)
---------	-----

· 人物论 ·

一个被儒化的英雄	
——关羽论	(3)
试论曹操形象的审美二重性	(17)
名士、贤相——道士、神仙——忠臣、贤相	
——论诸葛亮人格的演变和诸葛亮形象的塑造	(30)
《三国演义》女性形象的阳刚美	(48)
狂士祢衡	(64)
论张飞	(77)

· 杂论 ·

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	
——《三国演义》主题新议	(101)
罗贯中原籍辨析	(113)
《三国演义》版本系统及其版本演变	(119)
《三国演义》版本二题	(133)
《三国演义》出版刍议	(148)
《三国演义》的战争描写艺术	(163)
后记	(269)

人物论



一个被儒化的英雄^①

——关羽论

《三国演义》第七十七回，关羽被害，结束其英雄一生。作者罗贯中有诗赞云：

汉末才无敌，云长独出群。

神威能奋武，儒雅更知文。

这赞词，可以说概括了关羽一生业绩和关羽这一艺术典型的本质特征。的确，如果我们将关羽与三国其他战将，不论是与张飞、黄忠、赵云、马超等人比较，还是与曹营中的张辽、许褚、曹洪、夏侯渊等人比较，还是与东吴的周瑜、甘宁、黄盖等人比较，还是与颜良、文丑等人比较，我们便发现关羽具有明显不同于他人的风姿和气质。除了勇武之外，更多地带有儒将风采，是一个被儒化的英雄。

一、忠义的化身

毛宗岗认为，《三国演义》有三绝。关羽乃其一，为“义绝”。他说：

历稽载籍，名将如云，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。青史对青灯，则极其儒雅；赤心如赤面，则极其英灵；秉烛达旦，人传其大节；单刀赴会，世服其神威。独行千里，报主

^① 原载《许昌师专学报》(社会科学学版)1988年第2期。

之志坚；义释华容，酬恩之谊重。作事如青天白日，待人如霁月光风。心则赵抃焚香，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；意则阮籍白眼，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。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。^①

近人黄摩西也说：

历稽史册，壮烈仅以“勇”称，亦不过贲、育、英、彭流亚耳；至于死敌手，通书史，古今名将，能此者不乏人，非真可据以为“超群绝伦”也。^②

这些评论，可以说抓住了关羽形象的基本气质。“义”是关羽精神世界中最重要东西。“勇”，一般说来属于人的气质、能力，是外在的；“义”才是人的道德、品质，是内在的，属于人的精神素质，德的范畴，也是一个人身上最重要、最为宝贵的东西。关羽身上如果没有那种“义重如山”、“义贯长虹”的“义”的品德，虽可称英雄，但却只能与孟贲、夏育、英布、彭越等武士为伍，不得称“超群绝伦”。正因为有“义”支持其勇，忠义双全，才使关羽成为非凡人物。

的确，关羽历来被视为“义”的化身。《三国演义》又竭力渲染关羽身上的“义”。从第一回“桃园结义”到七十七回舍身赴义，“义”作为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，支持着关羽的一生。

关羽的“义”，首先表现在与刘备、张飞的兄弟情义上。

《三国志》本传载：关羽与刘备“寝则同床，恩若兄弟，而稠人广坐，侍立终日。随先主周旅，不畏艰险”。刘备为君后，这种兄弟情义又加上了忠君的内容。但联系关羽与刘备、张飞关系的，仍然主要是兄弟情义。根据《三国志》本传载：“初，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，将东征，秋七月，遂帅诸军伐吴。孙权遣书请和，先主盛怒不许。”可以不要社稷，置蜀吴联合以抗拒曹操的统一战线不顾，兴师伐吴，这就把兄弟情义放在国家利益之上。《三国演义》

对于关羽与刘备、张飞如同手足的兄弟情义作了进一步渲染。

关羽被困土山，束手待擒。曹操不忍加害，派张辽说降。关羽为了完成追随刘备，匡扶汉室的大业，为了使二位嫂嫂不受到伤害，不辜负刘备的托付，愿意投降曹操。但提出了投降的三个条件，即“一者，吾与皇叔设誓，共扶汉室，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。二者，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，一应上下人等，皆不许到门。三者，但知刘皇叔去向，不管千里万里，便当辞去。”这三个条件，毛宗岗评曰：“辨君臣之分”、“严男女之别”、“明兄弟之义”^③，均以义为其核心和出发点。曹操封关羽为“汉寿亭侯”，不足以动其心，赠金、赐袍，不能夺其志，惟其赠赤兔马，关羽欣然受领，再拜称谢。原因何在？曹操甚是纳闷，派张辽询问，引出关羽肺腑之言：

公曰：“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。奈吾受刘皇叔厚恩，誓以共死，不可背之。吾终不留此，要必立效以报曹公，然后去耳。”辽曰：“倘玄德公已弃世，公何所归乎？”公曰：“愿从于地下。”

言辞铮铮，肝胆照人，使曹操闻之亦感叹曰：“事主不忘其本，乃天下义士也”。关羽一旦得知刘备消息，便毅然挂印封金，保护二位嫂嫂，过关斩将，千里独行，寻找刘备。这都是义之使然。关羽兵败麦城，在内无粮草、外无救兵的困境中，吴侯派诸葛瑾来劝降，关羽回答说：“玉可碎而不改其白，竹可焚不毁其节，身可殒，名可垂于竹帛也。”大义凛然，气贯长虹。关羽被俘，孙权劝其投降东吴，关羽曰：“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，誓扶汉室，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耶！”坚贞不屈，从容就义，完成了道德上的义的自我完善。

关羽的“义”，还表现在“义释黄汉升”上。这种义，不同于君臣大义，也不同于兄弟情义，而是英雄间的相互理解和爱怜。关羽不杀坠马的黄忠，黄忠不射重义的关羽，都带有重友谊、知恩必报的侠义性质。

关羽“义释曹操”，这是历来争论最多的问题。关羽在这个问题上也多受人指责。

曹操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篡逆奸臣，是蜀汉政权的死敌，无论从匡扶汉室、上报国家、下安黎庶，还是从刘备集团的远图大计讲，都不能放走曹操。放曹既负汉室，又负刘备，并失兄弟情义，是不忠不义的行为。但是，从另一方面讲，关羽与曹操的关系又是极为复杂而微妙的。十八路诸侯兴兵讨伐董卓时，作为刘备身边的一个小小马弓手的关羽，在众诸侯面前受到蔑视和嘲笑，只有曹操认识到关羽的价值，力排众议，让关羽出战，并“教酹热酒一杯，与关公饮了上马”。除刘备、张飞外，曹操可以说是关羽遇到的第一个知己。土山被围，暂依曹操后，曹操对关羽可以说是恩义并重。不仅“封侯赐爵”，而且还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；上马一提金，下马一提银；又是赠袍，又是赠马，以结其心。关羽得知刘备下落，挂印封金，千里独行，追随刘备。这一举动引起曹操身边大将如蔡阳者不满，要提兵追杀。曹操不违前诺，不让追杀，还赞扬关羽的义气。对关羽说来，恩义是很难分开的。重义，必然不能忘恩。所以，曹操对关羽的恩义，又使关羽犹豫、动心、动情，不肯加害，可见关羽华容道上放走曹操，是有其思想根源的。这一点，诸葛亮也是知道的。说天命不绝曹操，那是诸葛亮的唯心说法，但说他看到了关羽与曹操的这种微妙关系，给关羽做个人情，却是诸葛亮的世故处。

在《三国志平话》中，说的是华容道上“面生尘雾，使曹公得脱”，似乎在为关羽开脱。可贵的是罗贯中没有回避关羽身上所表现的“忠”与“义”的矛盾，而是将关羽放在“忠”和“义”的矛盾中，很好地展示了关羽当时极为复杂的内心世界：

操从其说，即纵马向前，欠身谓云长曰：“将军别来无恙？”云长亦欠身答曰：“关某奉军师将令，等候丞相多

时。”操曰：“曹操兵败势危，到此无路，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。”云长曰：“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，然已斩颜良、诛文丑、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，今日之事，岂敢以私废公。”操曰：“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？大丈夫以信义为重，将军深明《春秋》，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！”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，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。又见曹军惶惶，皆欲垂泪，一发心中不忍。于是把马头勒回，谓众军曰：“四散摆开！”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。……

从这段描写看，关羽放走曹操，至少有四个原因：一是知恩必报，恩怨分明。这也是义的重要内容。关羽既然是个“义重如山”的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忘旧恩，放走曹操，是完全可能的，符合关羽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。二是怜悯恻隐之心的萌发。关羽见曹军惶惶，狼狈不堪，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力。对于关羽那样的以勇武威震华夏的英雄来说，不杀失去抵抗能力的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不杀坠马之黄忠即一例。三是关羽良心发现，不忍杀操。武樗癭曾分析过关羽当时的心情。他说：“其时，操之掩面欲泣，作种种乞衷之状，举不足以动关公。所以动关公之心而拨转马头让操逃去者，即当日留书作别，追赠锦袍，桥上数言，依依不舍之一切神情，至此全于关公心目中发现。”^④天理良心使关羽不忍杀操。四是朋友间以义相许。他既然于我有恩，我亦不能对他无义。为了朋友之谊，甚至可以舍忠就义。曹操知关羽熟读《春秋》，对于关羽的这一品德是很了解的，他以春秋时庾公之斯不杀子濯孺子这一被视为千古义举的故事，感动关羽，使关羽闻之，“低首良久不语”^⑤，终于达到求生的目的。这“低首良久不语”，极为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关羽当时极为矛盾复杂的心情。

庾公之斯不杀子濯孺子事，见于《孟子》，宣扬的是知恩必报、

以义为重的思想。嘉靖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小字注记录了这件事。子濯孺子为郑国大夫，深精弓矢之艺，郑国君派子濯孺子领兵侵卫，卫国派大将庾公之斯迎之。郑兵大败，卫国令庾公之斯追之，子濯孺子手下的人说：卫国追兵至，可用箭射杀之。子濯孺子说：“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执弓”，料必死，问左右：追我的是谁？左右回答说：是卫国第一善射者庾公之斯。子濯孺子听后，说：我得以生还。左右问其故。子濯孺子说：庾公曾拜尹公之他学艺，尹公之他却是我的徒弟，尹公之他是个正直人，其朋友必是正直人也。果然庾公之斯不射杀子濯孺子；但为不废“君之事”，“遂抽矢去其箭头，发四矢而回焉”。“于是子濯孺子得命还郑，天下弥义”。庾公忠于君事，不得不射杀子濯孺子；但为了朋友间的义，又不能射杀子濯孺子，于是只得拔去箭头，以示不废君事。关羽当时所处情境，正类此。忠于君命，不能放操；不忘曹操旧日恩义，又不能杀操。曹操用此典故打动关羽，关羽果然作了历史上第二个庾公之斯。这里，在忠与义发生矛盾冲突时，关羽将“义”放在“忠”上，“义”可以冲击“忠”，压倒“忠”，无疑是对传统忠义观念的某种突破。

不过，在关羽那里，忠和义一般还是很难分开的。华容道放走曹操，可能是唯一的例外，在更多情况下，忠占着主导的核心的支配地位，义以忠为主，忠支持义。

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第二十回“曹阿瞞许田打围”。许田打围是曹操篡逆之心的第一次大暴露。曹操奏请天子打围，“帝不敢不从”，权臣之势已压帝王，所以毛宗岗认为“献帝之猎于许田，是权臣耀武”^⑥。以下压上，有悖君臣之礼。操在田猎中，讨天子雕弓、金靴箭中鹿，群臣以为是天子射中，高呼“万岁！”操“纵马而来，遮于天子之前，以当迎之”，更是欺君罔上，“无君之罪”^⑦。关羽见状，“剔起卧蚕眉，睁环丹凤眼，提刀拍马，要斩曹操”。毛

宗岗评关羽此举：“云长之欲杀曹操，为人臣明大义也。”^⑧这里的义，就是忠君，除篡逆，忠于汉室。关羽投降曹操的三个条件，要义亦在忠。忠于汉室，忠于刘备。刘备称帝后，关羽与刘备的关系，虽然维持着兄弟情义，但在极大程度上融注了忠的内容。可见，在关羽的义中，忠仍然占着主导的支配地位，并做到了完美的融合。正由于此，关羽才被人们视为“忠义”的化身。

比较一下关羽的义与张飞的义，是很有意思的。张飞也是很讲义的，但张飞的义与关羽的义是有很大的区别。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忠君问题上。《三国志平话》中的张飞，“据山南一古城”，自号“无姓大王”。古城内建一宫，名曰“黄钟宫”，立年号为“快活年”。自立为王，自建年号，当然是无君之举。嘉靖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也写张飞自与刘备失散后，“自礪山中飘荡落草”，虽然隐去了张飞头上的王寇、年号，但仍写出了他的绿林气概。毛本虽有较大改动，但也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张飞身上的绿林气质。可见，张飞之义，更多地带有劳动人民的朴素情感。关羽的义，则完完全全符合儒家礼义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关羽“义”的典型性。

总之，关羽的义具有十分复杂的内容，既含有兄弟情义，又熔铸着忠的内容；既有知恩必报、以义相许，将朋友之情看得至高无上的劳动人民的朴素感情，又带着某种程度的君子气度和怜悯心。正因为它具有如此复杂的内涵，所以才满足了各个阶层的人对义的理解和需求。统治阶级利用关羽的义，人民群众也接受关羽的义，利用对自己有用的成分。可见，看不到关羽义的复杂内容和能够满足各阶层人所需要的特点，而一概看做是封建糟粕而予以摈弃，显然是不对的。当然，我们同时也应看到，关羽的义，从本质上讲，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小生产者的狭隘的政治道德观念，包含着浓厚的报恩思想。这种思想往往又会导致敌我不